



合作之契，当于危机未然时

作者：[Ian Bremmer](#) 和 [David Lipton](#)

2016年9月29日

国际合作精神经常在最需要和最能产生作用的时候消失不见。而缺乏合作导致危机发生；直到危机发生，各方才不得已开始合作；但是，此时的合作只能说是收拾烂摊子了。

我们在“大萧条”时期见证过，当时国际社会未能达成共识，无法就货币、汇率和贸易政策进行合作。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的时候，此前合作缺失的苦痛教训催生了我们当代人所熟知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格局。而在目前，经济和政治分离化力量再次抬头，我们注定会重蹈历史覆辙吗？

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跨度中，各国所支持的全球秩序基于的是旨在维护经济稳定和保障安全的制度安排。尽管该秩序不算完美，但是它能在充分保护国家的至高权力和主权的同时促成有意义的和建设性的国际合作，因而获得广泛和持续的支持。纵观被经济衰退所打断的长期繁荣发展阶段，纵观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后时期，这一秩序带来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并且它使人类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让几亿人摆脱了贫困，并造就了全球中产阶级大军。

不满情绪滋长

然而，当前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秩序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一系列挑战，包括公众支持日渐衰减，不确定的氛围加深。在10月7日华盛顿举行的基金组织年会的研讨会上，我们将寻求加强合作对话。Ian就此议题还撰写了一篇[背景文章](#)。

在经济方面，由于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害、收入增长减速、技术进步导致许多职业被淘汰，以及全球互联带来的个人和社区的社会移位效应，发达经济体内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日益明显。

停滞不前的中产阶级工资、疲弱的就业增长，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正在损害社会契约。机会主义政治领袖正在成功地利用着人们对迅速变化（不是普通公民所能控制的，甚至也超出了当选公民代表的控制）的恐惧心理。在美国，少数族群和妇女取得的经济进步虽然得到许多人的称颂，却也引起了那些痛感自己被社会甩下的人群的抵触。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努力应对新兴中产阶级越来越高的期望与全球和国内经济放缓情况下政府履职能力不足的矛盾。

但是，这些挑战已经超出经济学的范畴。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全球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近十年里，美国和

欧洲都将很大部分政治精力集中放在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上，这种关注使得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意愿下降。同时，中国的快速增长及其在亚洲和非洲的积极参与导致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全球平衡出现倾斜。中国经济增长尽管有些放缓，但仍占全球经济增长的 35%。新兴市场国家有理由要求增加在国际论坛和国际机构的话语权。

地缘政治力量

与此同时，非国家性质势力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威胁和损害，使得国际合作的推进更加复杂。中东地区战乱仍使得一些国家风雨飘摇，ISIS 有坐大之势，难民潮也给该地区和欧洲带来巨大的负担。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威胁现已成为所有国家日常生活中令人担忧的事实。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合作解决。

在地缘政治领域，**其他重要因素使得合作的难度增加**。国际社会对美国策略的强烈反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原因包括美国频繁使用制裁措施（被视作“金融武器化”）、在其他国家境内用无人机发动空袭，以及非法监听外国领导人。

欧洲领导人面临一筐子非常棘手的内部问题，包括管理难民危机、进行退欧谈判、遏制恐怖主义，以及缓和国民对改革和变化的厌烦情绪。

最后，与其国际重要性的提高和在全球的利益增加相称，新兴大国——巴西、印度、中国、俄罗斯和南非等国——渴望通过提高其在国际机构中的权力和影响力，扩大其在各自地区及全球的势力。对于上述渴求发达经济体是否会做出让步，或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后做出让步，这些国家不抱幻想。于是，它们设计并筹资扩展了一些其他渠道，例如设立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新开发银行等机构，或进一步推进本国经济开发，并拓展自己在海外的影响力。

导致合作难度提高的另一个层面来自**颠覆性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发展、分布式账户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人工智能。这些科技进步有巨大的前景，但同时也对现有机构和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并可能削弱现有法律和监管制度的有效性。

这些趋势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而，它们也可能使人们提高预防性储蓄，使战战兢兢的投资者继续观望，从而阻碍需求增长。

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当下，尤其在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如何规划你的退休生活？在“退欧”时代，我们如何投资于欧洲的未来？在一个国家机器行将崩析、对手盟友变幻莫测、非国家性质势力森然逼近的环境下，如何在中东投资？在工人逐渐被机器取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各类非国家性质势力有能力挑战国家有效执政能力的情况下，各国如何为应对内部扰乱做好准备？

“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全球秩序被质疑时，再问一次那个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著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

关于目前的困境，具有讽刺意味的回答是，我们可以从世界关联性和国际合作中获得比以往更多的益处。如果随着经济日渐成熟和生产率增长放缓，发达经济体面临更严峻的挑战，那么，他们更不能放弃贸易带来的好处。如果要维持并最终加快增长率，实现生活水平趋同，新兴市场必须继续依赖贸易、资本和技术，而这些都是世界互联性的组成部分。

关键在于，要通过合作重振增长，保住全球化的成果。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20 国集团将继续在此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员国需落实并加快推进该集团在今年杭州峰会上达成的增长倡议，利用所有政策手段——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基金组织最近的分析表明，全面、一致和合作的行动将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收获更多成果。

但是，在此进程中，全球和各国经济需增强其包容性，减少伴随全球化的经济不安全和不平等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变化产生了赢家和输家。我们也承认，地缘政治性的“创造性破坏”正在加剧经济性社会移位带来的焦虑心理。

因此，在努力促进增长的同时，我们须采取政策来帮扶穷人和那些因变化而失业或受到不利影响的群体。各国必须对再分配政策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这需要我们特别注重为失业工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技能培训，以让他们在 21 世纪经济中具有竞争性。如果政府能够满足公民对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强人身安全的期望，民粹主义信息将失去紧迫感和吸引力。繁荣的经济又可以进一步地支持安全保障和地缘政治合作。

最近有很多关于“建围墙”的无稽之谈。在现实中，我们需要的防御性“围墙”是指改善国际社会防御未来危机的防火墙。这一工作需要通过更好的协调来限制经济脆弱性带来的溢出效应；通过更强健的金融监管，防止对银行和资本市场的滥用；以及通过税务合作和协调，限制因企业跨境转移利润导致的国家税收减少。

这些工作目标要求我们进一步接受多极化的世界。我们需要保护，并在必要时，改革核心多边机构，如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这些机构要继续发挥，需推动机构治理不断演变，以反映不断变化的全球实力格局。同样的方法意味支持和整合新兴市场推动的新的机制和倡议。此外，还需要通过促进合作和协调，强化现有地区金融安排，如清迈倡议。

最后要说的是，现在必须打破国家和国际决策中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长期分离的局面。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两者不可分割，领土争端和市场波动可能会彼此反响，造成混乱，这种变化模式已经完全突破了 20 世纪的体系。此外，只有采取综合的方法（该方法认识到安全威胁会产生经济影响，而经济不稳定会滋生安全威胁）才能克服国家崩溃、非国家性质势力活动和地区冲突带来的危害，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和屈从于经济和政治的分离化力量，开展严肃对话和培育新的合作精神的时机已经到来。
